

郭良平专栏

# 二十大的路线比人事更重要

中共二十大前夕，围绕着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，这一届政治局成员的去留，谁可能是黑马，同最高领导人的关系和渊源等的猜谜游戏，进入疯狂期。各种政治局和常委的预测名单竞相出炉，不少人还押上赌注。以往有不少媒体追捧的专家学者信心满满却铩羽而归，但仍乐此不疲。每次猜谜季节都是媒体盛宴。然而对二十大而言，路线方针比人事更值得关注，这是因为绝大多数“预言家”都认为习近平会连任。

中共早在2017年的十九大就已经通过了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”（简称“习近平思想”），目前党内并没有出现其他有竞争力的主张，这就决定了习地位的延续——除非出现重大意外。“习近平思想”对第二个百年的蓝图规划和治党治国的方略是个庞大体系，是党代会通过、写入党章的。没有习近平的习路线怎么执行？如果习近平和习在二十大后继续主导，任何人事变动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。

现在大多数人继续沿用“左—右”“开放—保守”的旧话语体系来解读目前这个“百年变局”。不久前，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依托的自由主义曾经有强大号召力，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和现成的选择，得到西方国家大力推销售和鼓舞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自由主义的威信一落千丈，不仅在国家治理、政治文明上漏洞百出，造成社会撕裂和极端主义，在经济管理上也出现大问题，市场比人强的信念被根本动摇了。当美国出现现实的国家分裂危险时，很难责怪他国不再将它当成楷模。

在许多人眼里，中国总理李克强等代表了“自由进步力量”和改革开放的希望。如果李上位的话，立刻就面临朝哪个方向走、采用什么纲领路线等问题。如果拿不出像习近平思想那样的清晰和系统化主张的话，结果必然是“百家争鸣”，各种利益集团蜂起，用各种漂亮口号来饱私囊——像在许多选举民主国家上演的政治闹剧一样。中国就会继续长期摇摆，方向不明。

中国人最害怕分裂和不确定性，将中共这个9500万党员的大党拢在一起，也需要统一纲领和强势领导人，于是党内外的社会心理就会偏向习。虽然许多人对习近平思想不能完全苟同，但也勉强可以接受。他们希望那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将来实施过程中能调整。这种现实主义的需求为习的理想主义纲领，奠定了党内民意基础。

习在党内的另一个有利条件，是在毛泽东时代长期形成的党内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。当前中共的中高层干部，大都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，在发达的党内教育、宣传和指令体系中，早已形成一套独特的话语和“心理习惯”。他们能够不加思索地对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抢答，并且有把握同事或其他党员都会做出同样回答。这关系到党内“政治正确”或“党性”，习近平正是同党内这套话语体系接轨，才取得主导地位。

习近平是在毛泽东之后企图创造宏大叙事的唯一最高领导人。邓小平的“白猫黑猫”，江泽民的“三个代表”，胡锦涛的“科学发展观”，要么是实用主义，要么是部分叙事。习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完成这个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，一是改革开放数十年的经验积累，一是大量借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。他为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和做法正名、平反，并纳入自己的“思想”和纲领。这一方面省去许多理论上的麻烦和争议，另一方面同党内长期形成的思想方法、话语体系和其他习惯或传统接轨，中国的广大老百姓也熟悉，比较容易被接受。

## 习近平思想需大量实践检验和修正

毛泽东思想的酝酿，如果从1927年上井冈山算起，到1943年首次提出，1945年被中共七大正式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，共花了18年，而且提出后有很长时间并没有确定下来。比如1956年的八大，又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党章中删去。它在文革中则一飞冲天，成为“大树特树”的金科玉律。所以，毛泽东思想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方修正果。尽管如此，对它的不恰当使用，还是导致大跃进的灾难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大规模、长时期的动乱。

习近平从十八大起步，到十九大正式成为全党指导思想，

习思想中大量的毛泽东思想成分，由于产生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，都没有经过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检验。检验出来的问题和必要的修正，需要一个有效而及时的纠错机制，并有制度化的保障，以便给集体智慧一个发挥机会。这里最大的威胁是“伟大领袖模式”。一旦进入这个模式，就会丧失纠错机制，“伟大领袖”的面子和自尊就会成为国家利益的最大绊脚石。

只花了五年时间。在今天这么一个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中，短短几年就搞出一个庞大的体系，由党代会通过，写入党章，并作为正统来广泛宣传、学习和要求所有党员效忠。这只能得出几个结论：一、这是列宁主义式政党的急需；二、它没有通过党内充分酝酿和辩论，主要是少数人冥思苦想的成果；三、它需要大量实践检验和修正，方能成熟成型，绝不能一开始就被当作金科玉律。

从过去10年的结果来看，习近平的成绩单是二分的。有的方面，如亲民、反腐、净化官场、打击党内外寡头势力、治理环境、消灭贫困、强化党纪国法等方面，成绩优异。在人权、自由、民主、宽容等方面，至少在国外被普遍认为退步了——这与当政这一代的认知结构和思想方法有关。

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急剧恶化，同美国的关系濒于新冷战边缘，在许多主要国家的民调中声誉屡创新低。被认为对民族复兴最重要的，也是几乎所有人最关注的，是经济增长和创新创业的能力和可持续性。这方面有许多问号。

中国经济增长10年一路下坡，缺乏新动力，而旧动力已经衰竭。创新创造原非中华民族的长处。中国40年高速增长的列车，创新的火车头主要挂在海外。作为一个后起发展中国家，搭他人创新发明的便车是必经之路和国际惯例；中国须要长期依赖这个发展模式，直到自己的创新体系成熟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新加坡等是走这条路成功的例证。但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后，后者要摘掉这个外挂的车头，同中国脱钩。这是一个全新的巨大挑战，现在国外已经有人在讨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，是否会永远无法超过美国，中国是否会坠入中等收入陷阱。

看来中国寄希望于“新举国体制”。但从历史上来看，“举国体制”迄今只在少数领域实现了零散的突破，从未形成产业化和工业全面升级，并且代价巨大。这并不是说“新举国体制”必然失败，但要提防靠炒作新概念来搞忽悠。中共的干部非常擅长在上面定下的框架内标新立异，既表达忠诚也彰显政绩。这其实是一种忽悠，也是官场必备的生存技能和竞争优势。

比如，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因为“马克思主义行”以及内涵模糊的“中国梦”，都涉嫌忽悠。投资、创业、企业管理、市场化、私企的崛起、外资的引进和管理、国外市场的开拓、科学技术和教育的现代化、地方政府的改革、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运作、高技术企业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、军队的现代化、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、环境治理的模式等等，这些构成中国发展奇迹的要素，同马克思主义八竿子都够不着。如果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来发展经济，就必须走发动阶级斗争、回归计划、搞大跃进式的运动经济、依靠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、自力更生的老路了。

习思想中大量的毛泽东思想成分，由于产生于一个非常不同的时代，都没有经过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检验。检验出来的问题和必要的修正，需要一个有效而及时的纠错机制，并有制度化的保障，以便给集体智慧一个发挥机会。这里最大的威胁是“伟大领袖模式”。一旦进入这个模式，就会丧失纠错机制，“伟大领袖”的面子和自尊就会成为国家利益的最大绊脚石。如果最高领导人提出的任何东西都能够高票通过，这个党就已经被投机钻营者和利益集团窃据了，再也不是充满奋斗精神和生命力的政党。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亡党亡国，是毛泽东晚年押上他全部政治生命竭力避免的那种。

由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十八大报告，鲜明提出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，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”，这个决心下得很早也很对，因为它看准了中国必须开辟自己的道路，但这个新路子不是现成的，须要探索。“习近平思想”就是这种努力的成果。作为一个初步框架，它为下一步的实践提供了出发点和方向感，但作为没有经过验证的理论体系，它不能一开始就将一切都框定锁死。比如在外环境全面恶化、逆全球化潮流涌起、战争因素增加、国际秩序面临全面失序、国内经济增长乏力、各种危机交织的条件下，它须要做什么调整？是否能建立起可靠的议政和纠错机制？这些才是二十大的真正看点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